

试谈卡尔·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历程

张颖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理论权威, 对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进行一刀切式地理解。本文将其思想历程分为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三个时期来考察。这种划分是相对的, 因为考茨基的思想终生都受达尔文主义等的影响, 并且其思想特点犹豫不决一直贯穿其一生, 就算当考茨基演变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后,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定他的理论观点在一切方面都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

关键词: 考茨基; 第二国际; 前马克思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 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达尔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D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1-0041-06

考茨基作为第二国际的核心人物和理论权威, 其思想的演变轨迹基本可以看作第二国际历史角色演变的缩影, 同时也代表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途径的各种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考茨基思想的历史演变也成为对他本人进行历史定位或评判的依据。而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定位莫过于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将考茨基定位为“十足的叛徒和资产阶级走狗”, 自此“叛徒”标签的影响力就远远盖过了考茨基前期所有的声望和荣誉, 并一直伴随考茨基晚年直至去世。直至今日,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 考茨基也一直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受重视。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考茨基一生思想演变历程, 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中对其进行定位。

在对考茨基具体思想演变进行考察之前, 有必要回顾总结一下对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及其定位的各种观点。总体看来, 对考茨基的评判大体有三个方向, 一是完全肯定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认为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以考茨基的亲属以及巴尔特·特洛姆普为代表, 其中特洛姆普认为考茨基是发明马克思主义的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继承人^{[1](36)}。他的儿子贝奈狄克特·考茨基认为, 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典范。考茨基的孙子约翰·考茨基认为“在其所有的著作中都论及到了马克思主义”。^[2]二是完全否定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这以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以科尔施为例, 他指出考茨基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并且把考茨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说成是“考茨基和他的一伙在最近几年完成的从隐蔽

修正主义到公开修正主义的过渡的概括说明”^{[3](203)}。第三种则是沿袭列宁的观点, 认为考茨基虽然后期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但毕竟有过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以苏联学者居多, 比如斯·布赖奥维奇等。布赖奥维奇把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时期, 大致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 第二个时期是维护马克思主义时期, 时间是19世纪80年代初到1910年以前; 第三个时期是演变为机会主义时期, 时间是1910年到1938年。^[4]而中国学者也已经对考茨基的思想分期作了不同的划分^①, 本文把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 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年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年—1914年)、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1914年—1938年), 并将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大致概括为从激进民主主义到“正统马克思主义”再到改良主义。

一、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年以前)

考茨基在晚年回忆录中说到, 从进入维也纳大学开始, 他的活动“总是在科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之间兼顾”^{[1](4)}, 所以考察考茨基早年的思想历程, 应该从对考茨基的政治思想、科学研究以及他的政治活动等实践进行分析。

在政治思想方面, 早年的考茨基经历了激进的捷克民族主义到浪漫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捷克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和逐渐消除, 都是与考茨基的复杂的民族家庭背景有密切联系。考茨基捷克民族主义的产生

或多或少会受到其父捷克民族思想的影响。当然,更为直接的事件应该是在1868年考茨基拜访波西米亚乡镇的叔叔时,被当时农民激烈的反叛所触动。但是考茨基是在一个完全德意志家庭中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考茨基的捷克民族主义是很难维持很久的。在民族问题上,考茨基处于一种游移不定的政治感情生活中,不仅同情捷克人,实际上也同情德意志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5](19-21)}。1871年巴黎公社使考茨基产生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同情,而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则给考茨基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的知识。因此,到1871年末,考茨基的捷克民族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浪漫的社会主义的或激进民主主义,它是以同情低等阶级为特点的;并且相信通过知识和研究,能够洞悉未来社会的道路。

在科学知识思潮方面,考茨基受到了英国实证主义史家亨利·托马斯·巴克尔、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庸俗唯物主义代表人路德维希·毕希纳以及英国科学家达尔文等的影响。在这种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他开始了历史、科学、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研究的,并且这种研究“无非是要把达尔文主义应用于社会发展”^{[6](5)}。代表作就是1878年考茨基完成的第一本著作《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其主要理论出发点是从达尔文主义出发,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但是对新马尔萨斯理论确抱有好感。而考茨基研究社会主义开始于拉萨尔,并受到“铁的工资规律”影响。同时考茨基也开始研究经济学,他曾尝试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但灰心地放弃了,转而研究马克思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比如英国的罗歇、亚当·斯密、李嘉图、约翰·穆勒等,并且考茨基在回忆录指出此时研读穆勒和巴克尔的书要比马克思的多得多。此时考茨基的经济学观点实际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是带有强烈的折中主义性质的。

在政治活动方面,1874年考茨基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次年一月,便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他的政治发展历程对他的科学发展历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考茨基正式研究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平等报》的推动下开始接触拉萨尔的著作开始的。1876年,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接触并建立联系。1877年,考茨基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后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79年考茨基开始为卡尔·赫希伯格撰稿,之后被赫希伯格邀请去苏黎世为其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和《政治经济论丛》撰稿,使他改变了生活道路,从此开始了写作和社会民主党职业活动家的生涯。

从考茨基的早年经历可以看出,在政治思想上经

历了激进捷克民族主义到浪漫社会主义的过程,并最终成为社会民主党职业活动家,在科学思想上主要是受到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并且构成考茨基的新的世界观,并将这一世界观运动于各种理论研究。在社会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方面,主要研读了拉萨尔、朗格以及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凯里和杜林的著作。而马克思远没有引起考茨基的注意,他对马克思还是持淡漠的态度,并对马克思理论“采取批评和不信任态度”^{[7](9)}。

二、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1914)

在1881年到1914年30多年时间里,考茨基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考察,考茨基在此期间实际上是经历了从正统到中派的一种演变。他的理论活动大致可概括为流动时期(1880—1890)的普及马克思主义和与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辩,1890—1904年的反对修正主义,1905—1914年的应对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挑战。

(一) 普及马克思主义及其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

1880年到1890年考茨基的理论活动基本在苏黎世、维也纳、伦敦以及斯图加特等城市进行,正是在此时期考茨基建立了同恩格斯、倍倍尔、伯恩施坦、维克多·阿德勒等人的友谊,也是在这个时期考茨基的思想逐渐地从浪漫的、自然科学的社会主义逐渐转变为具有恩格斯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最终逐渐成为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从1883年末开始,考茨基越来越多地致力于马克思的研究,而越来越少地关注自然科学的主题。1885年,考茨基迁居伦敦,在恩格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1885年到1890年之间,考茨基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积极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用历史的观点研究经济学,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具体的社会历史问题特别是社会思想史。此时考茨基已经成为坚定的恩格斯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期考茨基有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主要有两个主题,第一是用更为简单、通俗化的形式解释马克思的著作。比如考茨基和伯恩施坦共同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此书马克思的原稿是法语),并且考茨基在恩格斯的鼓励下还独立撰写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希望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通俗的解释来满足广大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需求,成为第二国际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通俗阐释的代表之作。第二,在恩格斯的鼓励下,

考茨基以马克思的名义同一切伪装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进行辩论。因此,事实上,从1885年起,考茨基此时已经离开了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那种自然科学主义,而真正意义上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世纪80年代末考茨基的两本历史著作,《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和《法兰西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1889)是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范例。这两部著作特别是《阶级斗争》使考茨基真正意义上运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历史研究,并且让考茨基做好了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权威的准备。

(二)反对修正主义

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的解除,可以看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在接下来的25年中,德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发展为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党,而考茨基也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壮大逐渐赢得了国际声望,成为一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使马克思主义从一个深奥难解的体系转变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纲领^{[8](252)}。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宣传和组织的民主条件具备以及取得的成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差异更加明显了。而考茨基在1890—1914期间就应对了来自温和派和激进派的挑战。

考茨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集中在土地问题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189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勋朗克联名提出了一项关于农业问题的草案,主张保护农民,次年在布勒斯劳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等又向大会提出了“农业纲领草案”,主张只要社会民主党采取适当的方式,是可以争取农民支持社会民主党的^{[9](4, 230)}。考茨基批判福尔马尔和大卫等人的“保护农民”以及争取农民支持的主张。考茨基从分析无产者的特征出发,指出农民还不完全具备无产者的特性,有时农民利益与无产者利益是对立的。考茨基批判福尔马尔和大卫,认为他们保护农民实际上就是保护导致农民贫困的农民所有制,保护把农民锁在贫困上的枷锁^{[7](320)}。

在考茨基写作《土地问题》同福尔马尔、爱德华·大卫进行土地-农民论战之时,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已经蔓延开来。考茨基从一开始对与伯恩施坦的论战就不感兴趣,因为与土地问题不同,和修正主义论战仅仅是为考茨基早已深信不疑的信念进行辩护,而不会给他带来新的启示和知识。因此伯恩施坦开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标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之时,考茨基是深有同感的,把他看作恩格斯和自己“已经开始的做法的继续”^{[6](21)}。但是当伯恩施坦系统地概括和阐

明自己的观点时,考茨基对伯恩施坦则由怀疑变成了激烈的反对。然而他对伯恩施坦的反对不在于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哲学的歪曲,而是对资本主义理论的歪曲。在同伯恩施坦论战中,考茨基捍卫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反驳了伯恩施坦用以反对资本集中的“小生产稳定论”,同时,考茨基也进一步阐释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坚持阶级对立两极化,而贫困化理论则构成了考茨基革命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10](43)}。再次,考茨基坚持了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必然性。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暴力革命已经过时,主张通过议会政治斗争来夺取统治,并且认为民主不仅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11](189)}。虽然考茨基也非常重视民主,但认为民主并不能阻止革命,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社会改革和无产阶级组织加强,只会导致战斗的无产阶级产生出更先进的革命分子,使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由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斗争,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不是民主逻辑的完成,而是阶级斗争逻辑的结果。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正统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关键区别^[12]。

总的来说,考茨基与伯恩施坦的论战,集中表达了考茨基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虽然最初持犹疑态度,但不得不说考茨基的态度是真诚的,在抑制修正主义思潮中,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应对左派挑战

从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到1914年一战爆发,第二国际内部在如何对待俄国革命经验、是否承认政治性群众罢工以及在如何对待战争问题上逐渐分化为左派、中派和右派。大体上说,左派认为俄国的革命经验同样适应于欧洲,主张政治罢工和革命暴力;右派根本否定俄国革命,推行合法改良主义;中派肯定俄国的政治罢工和暴力革命,但是在俄国经验是否适应于西欧上,持保留态度。大致说来,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考茨基的观点是激进的革命的,是站在左派的,但是从1910年起,考茨基在《在巴登和卢森堡之间》中写道,在政治上巴登的修正主义者在右边,罗莎·卢森堡在左边,而他自己则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明确宣布转向中派主义立场。他另行提出不同于俄国斗争方式的“疲惫战略”,日益把批评的主要矛头指向左派。

关于政治大罢工问题,早在1891年,考茨基已经论证了政治大罢工的合理性,认为“如果暴力事件极大地唤醒了工人群众,那么大规模的罢工就能产生巨大的政治效果”^{[13](143)}。1905年俄国革命的胜利,

使政治总罢工复活,并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此时考茨基依旧肯定政治总罢工的有效性,并且强烈抗议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的《前进报》试图阻止大罢工的策略。不得不承认考茨基从不怀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保护必要时采用非议会制方法的权利和制度^②。但是又不得不说,考茨基的言论是有误导性的。毫无疑问,考茨基确实保护政党左派讨论工人大罢工的策略的权利,也做好准备去思考工人大罢工策略在具体情境下的使用。然而在工人阶级实践运动中,考茨基却从没有在任何具体形势下,倡议运用大罢工的策略。

与其说,考茨基关于政治罢工的观点发生了向中派的转变,不如说从一开始,政治总罢工在考茨基那里就是有限制的。考茨基在1902年就强调了他的罢工绝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工会的罢工,并且指出如果企图把政治总罢工当作一举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手段的话,这简直是无稽之谈。而考茨基非常注重罢工运用的条件,他指出政治总罢工仅仅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才迫切地需要,社会民主党只是把它当作极端特殊的手段来考虑的^{[14](158)}。也就是说,在考茨基看来,政治总罢工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补充手段,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不能把政治罢工作为一种正常的方式。在1910年后,考茨基既对俄国革命的普适性提出质疑,认为不能“把俄国的经验简单地当作现成的样本搬到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中来”^{[14](157)},同时又指责左派力图把整个工人运动极端化而成为政治性群众罢工和街头骚乱,实际是犯了“街头痴呆症”。此时关于政治罢工的限制性观点,在同左派的论战中完全暴露出来。

事实上,考茨基在此时关于政治罢工的讨论涉及到三个问题:政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自发性(主观)和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5](151)}。首先关于政治因素。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在讨论比利时工人罢工问题时,考茨基对欧洲国家的革命的前景做了分析。考茨基比较分析了德国和俄国的政治环境,指出德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府,拥有最强大、最有组织纪律的军队和官僚机制,统治一群热爱和平没有革命传统的公民。而俄国虽然工人阶级的发展程度以及经济程度远落后于德国,但是它的政府力量弱小,所以比起先进的工业国,落后的农业国更容易发生革命。因此,在分析革命前景时,考茨基优先考虑了政治因素,并且特别强调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在德国发生,就是因为德国政府强大的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下,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关系问题上,考茨基认为不仅仅是意志自己决定历史发展,而且还有叫做“实际条件”的东西。在工

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上,考茨基在写给阿德勒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满,他指着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是一个过分集中于官僚和议会制的老人的联盟,并且建议以增加工会联盟者和新闻出版者的形式给中央委员会增加新鲜血液^{[5](153)}。在党和工会的关系上当然坚持党对工会的政治领导,考茨基指出,“工会自治的理解是无政府主义的”,为了“使党和工会之间的行动能够协调一致……只有或者通过身兼数职,或者通过组织上的联合才能实现”^{[15](240)}。

可以看出在关于大罢工讨论的尾声,考茨基已经形成了关于德国社会的性质、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党的性质和社会未来的前景的成熟的观点看法。考茨基非常重视政治因素,把德国的国家性质这一政治因素看作是影响德国的统治性因素,并且认为阶级斗争中的政治因素优于经济因素。此外,考茨基还指出魏玛政府的另一个政治性质,即它保证了参与非议会制活动的工人的利益。在1906年以后,由于考茨基对德国政府是持敌对态度的,所以他仍旧激进,但是他又是温和的,因为他反对社会主义者为了创造了革命形势而进行的自觉的行动。考茨基认为政党在反对德国政府以及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方面是革命的政党,但“不是制造革命”的政党,因为与客观条件不一致(即德国政府的力量)的激进行动将只会导致灾难。考茨基非常愿意依赖德国社会内部固有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来引起革命形势;同时也愿意依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策略使工人为利用即将到来的革命做好准备。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考茨基1910年转向中派主义的基础,使他在大罢工等问题上与卢森堡、蔡特金等左派的差异完全暴露出来。

三、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 (1914—1938)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1938年考茨基逝世,在这段时期,在政治立场上考茨基实际上是处于几乎完全孤立的境地,用考茨基自己的话说就是同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处于对立状态,而又不能使少数派感到满意”^{[6](28)}。考茨基之所以陷入如此的孤立境地,一是由于在对待战争政策问题上的中间立场,二是采取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在政治活动方面,1917年,考茨基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显示与其他机会主义者的不同,同年4月在哥达成立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后被免去《新时代》主编职务。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被委任P·谢德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③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坚持改良主义。1921年2月，在维也纳成立第二半国际，1922年9月，将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右翼社会民主党合并；1923年5月，考茨基促成“第二半国际”与右派的所谓“第二国际”合并，并积极参与合并后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新纲领的起草。1933年，法西斯上台，考茨基迁居维也纳，并与次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籍。1938年，在阿姆斯特丹逝世。本节主要从考茨基对待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政治态度和他晚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表达的基本观点来考察考茨基该时期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

整个社会民主党在力求阻止战争的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当战争不顾社会民主党的反对仍旧爆发之时，在一战期间社会民主党就是否应该支持政府的问题而发生分裂。1914年10月，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考茨基在文中指出政府从来没有像战争开始时那样强大，而同样政党也从来没有像战争开始时那样软弱无力，以此说明战争期间行动的复杂性。并且宣称战争爆发之后，只要缔结和约的时间还不成熟，那么实际问题不再是要战争还是和平，而是本国胜利还是失败。以此，考茨基最终指出了在战争期间无产阶级的态度以及行动，在他看来，不论在哪个民族国家中，无产阶级应该拿出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国土的独立和完整，并且认为“如果尽管社会民主党尽了一切努力仍旧发生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也必须尽可能进行自卫。由此可见，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或者同等的义务参加这种保卫，任何一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能因此责备别国的社会民主党人”^[16]。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为“保卫祖国”的口号的辩护，构成并解释了考茨基在关于是否支持政府军事拨款问题上的中间态度。在考茨基看来，不应该无条件地赞成或反对德国政府为战争军事拨款的问题，因为德国政府已经举国上下地保证，只为自卫而战，其目的在于通过没有兼并、赔款、暴行的协商来尽快结束战争。并且1914年考茨基在大战前夕写成《帝国主义》一书，发挥他在1912年9月《再论裁军》一文中关于帝国主义只是贯彻资本扩张意图的一种方法而非经济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否认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17]。此时的考茨基与伯恩斯坦言归于好，交往甚密，考茨基承认，尽管二人保持着各自理论上的特色，但是在实际行动上两人是一致的。而正是在对待战争政策问题上，中间立场使考茨基陷入了完全孤立中，受到了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猛烈批判。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无

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讨论，又使考茨基在党内的孤立状态更严重了。考茨基对俄国十月革命最初是持欢迎态度，因为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政党成为了一个巨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当1918年布尔什维克解散了“立宪会议”，宣布以苏维埃为唯一政权形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考茨基立刻出来反对两种“妄想”，一是反对认为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像俄国一样的落后国家能够超过西方国家的信念，二是反对认为通过暴力以及少数特权派与人民大众的对立便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妄想”。考茨基连续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1918)、《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1921)、《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1932—1937)等著作，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1918年在德国中派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上撰文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为此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考茨基主要是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层面，去解读苏维埃政权，在考茨基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不仅理解为社会化地组织生产，而且理解为民主地组织社会”^{[13](326)}，而专政并不意味着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13](347)}。考茨基指责布尔什维克政党把“向来是一个阶级的战斗组织的苏维埃变成了国家组织”^{[13](362)}。

除了政治立场上的中立和民主社会主义外，考茨基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继续了他之前的折中主义特点，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系统地阐发了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考茨基晚年特别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特色，他指出虽然他没有忘记这种世界观要归功于两位伟大的老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通过五十年的工作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我已经使这种方法成为我自己的了”^{[18](16)}。但是考茨基一直主观上忠诚于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对各种新的自然科学成果和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兼收并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补充”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考茨基在捍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总体性质和理论意义上，深刻体现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诚。而在考茨基在运用早年所受到的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影响，对人性、社会结构、阶级和国家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时，也充分暴露了考茨基的折中主义等的理论缺陷。

通过考察考茨基一生思想发展的基本进程，可以看出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政治环境和工人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文对考茨基思想划分的分期是相对的，考茨基的思想终生都受到前马克思主义主义时期所接

受到的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等的影响,而且就算当考茨基演变为改良主义或变为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定他的理论观点包括唯物史观,在一切方面都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总之,对于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不能一概而论,重新考察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完整链条,更清晰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流派。

注释:

- ① 谢澹波将考茨基的理论活动划分为前马克思主义时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时期和机会主义时期,不过没有明确表明时间节点;姚顺良则将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3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社会主义时期(1884—1910年)、“中派主义”时期(1910—1918年),以及折中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时期(1918—1938年);王凤才则把考茨基的思想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年前)、马克思主义时期(1881—1914年)、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时期(1914—1938年)。
- ② 考茨基把1905年鲁尔煤矿工人举行群众性罢工,并且同年9月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通过总政治罢工的决议看作“光荣的日子”。
- ③ 考茨基一就职,独立派因无法与多数派合作而退出了政府,所以考茨基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在还未真正开始之前就结束了。

参考文献:

- [1]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2] 陈爱萍. 西方学者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J]. 哲学动态,2010(2): 9-14.
- [3] 马蒂亚斯. 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J].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 1983(1): 194-219.
- [4] 斯·布赖奥维奇. 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M]. 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6.
- [5] Gary P. Steenson. Karl Kautsky, 1854—1938: Marxism in the Classical Years [M].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79.
- [6] 考茨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3.
- [7] 考茨基. 土地问题[M].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1955.
- [8] Julius Braunthal.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Vol. I) [M].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67.
- [9] 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 福尔马尔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 [10] Jukka Gronow. On The Formation of Maxism [M]. Helsinki: Societas Scientiarum Fennica, 1986.
- [11] 伯恩斯坦.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 北京: 三联书店,1965.
- [12] Alan Shandro. Karl Kautsky: on the Rel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J]. Science & Society, 1997, 1(4): 474-501.
- [13] 考茨基. 考茨基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
- [14] 考茨基. 考茨基言论[M]. 北京: 三联书店,1965.
- [15] 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16] 考茨基. 战争时期的社会民主党 [J/OL]. <http://marxists.catbull.com/chinese/Kautsky/marxist.org-chinese-kautsky-191410.htm>, 2013-05-05.
- [17] 姚顺良. 考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的重新审视 [EB/OL]. http://www.ptext.cn/home4.php?id=273_2013/05/5.
- [18] 考茨基. 唯物主义历史观·第1分册[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the development of Karl Kautsky's theory

ZHANG Y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the leading theoretician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Kautsky should not be simply viewed as the renegade of Marxism.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Kautsky's theory was presented in three stages: pre-Marxism, Orthodoxy Marxism, and Unorthodoxy Marxism. Indeed, these stages are relative. Accompanied in all his life, on the one hand, Darwinism and ambiguity are characteristics of Kautsky's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Kautsky's theory should not to regarded as absolutely anti-Marxism even after his view carried the reformism implication.

Key Words: Karl Kautsky;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Pre-Marxism; Orthodoxy-Marxism; Unorthodoxy-Marxism; Darwinism

[编辑: 颜关明]